

他者的游戏:《蝴蝶君》中的华人男性形象^①

李道全

(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 文章通过对戏剧《蝴蝶君》华人男性形象的解读, 分析《蝴蝶君》剧作华人男性模棱两可的身份。本文指出, 华人男性他者身份的建构, 既有西方霸权文化干预的因素, 也有华人男子主动模拟。华人男子并非全盘被动地接受西方的操控, 而是积极采取模拟策略, 艰难地实现身份的自我表述。剧作《蝴蝶君》以一场“他者的游戏”, 警示操控他者的危险性, 指出对话他者的必要性。

[关键词] 他者;《蝴蝶君》建构; 模拟; 对话

[中图分类号] H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720(2010)01-0052-05

1 引言

华裔剧作家黄哲伦 (David Henry Hwang) 的剧作《蝴蝶君》(M. Butterfly) 获得美国戏剧界的“托尼奖”和普利策文学奖提名等殊荣, 也深受国内外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关注。程爱民主编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2003) 一书中就收录了两篇有关作家黄哲伦及《蝴蝶君》的研究论文: 一篇为宋伟杰的《文化臣属·华埠牛仔·殖民谎言——论华裔美国作家刘裔昌、赵健秀、黄哲伦》, 另一篇是卢俊的《解构蝴蝶夫人: 论黄哲伦的文化策略》。后殖民理论和解构主义理论为剧作的解读提供了犀利的视角。学者陆薇在 2007 年出版的专著《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中以《蝴蝶君》为例, 援引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 (Homi Bhabha) 的模拟、含混与杂糅的理论论述, 对剧作的书写策略展开了细致分析。此外, 国内社科学术刊物上三十余篇关于《蝴蝶君》的论文已经从文化策略、后殖民解读、解构主义视角、形象研究等角度展开广泛论述。毋庸置疑,《蝴蝶君》的创作策略实现了解构与颠覆的目的; 然而《蝴蝶君》塑造的华人男子形象备受争议。针对这一争议形象,

国内评论界偏重分析剧作华人男子的东方主义他者形象对东方西方、强弱、男女性别等等的消解, 但是对于剧作里华人男子模棱两可的他者身份未作深入细致分析。戏子宋丽玲的他者身份为何及如何被建构? 他/她是消极地被赋予他者身份还是积极地伪装? 模拟伪装他者的计端, 意欲何为? 这些问题的解答, 将有助于进一步开展剧作的解读。

本文聚焦《蝴蝶君》剧作中的华人男子形象, 深入分析文本中华人男子模棱两可的身份, 既关注华人男性他者身份建构的缘起、途径与目的, 也辩证地审视在他者面具伪装下, 华人男性身份的自我表达。笔者认为, 华人男性他者身份的建构, 既有西方霸权文化干预的因素, 也有华人男子顺势主动模拟。华人男子并非全盘被动地接受西方的操控, 而是积极采取模拟伪装策略, 艰难地实现身份的自我表述。剧作《蝴蝶君》为观众呈现了一场“他者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 当西方偏执地追求操控他者, 也会自食其果。透过“他者游戏”可以看出, 从操控他者转向对话他者,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尤为必要。

2 华人男性他者身份的建构

法国外交官加利马尔在自己的国家, 男性身份难以得到表述, 无法找到自我立足的根基, 无从树立自身的男性权威。小时候看到他叔叔收集的杂志女郎, 他便找到自己的权力欲望投射对象。“第一次在叔叔柜子里面看到那些杂志, 全堆积起来, 我的身体为之战栗, 不是出于淫欲, 不, 而是出于权力。这里的女性, 满架子的女性, 都会向我俯首称臣。”(David, 1989: 10)然而与本国女性的交往经历, 他遭遇挫败, 自身的理想男性形象无法树立。可见, 作为男性, 他一直期待建立自己的权威。杂志女郎, 可以任由他宰控, 但是现实中鲜活的西方女性给他打击, 让他受挫。于是, 他把希望就寄托在东方的, 心中自我构建的他者。谈到他者与此者的相互性, 波伏娃认为“并不是他者在将本身界定为他者的过程中确立了此者, 而是此者在把本身界定为此者的过程中树立了他者。(波伏娃, 1998: 13)这也表明, 他者不是主动赋予的身份定位, 而是由此者的身份建构确立而产生。鉴于他者的可操控性, 加利马尔便随意行使权力, 发挥男性权威, 构造理想的东方他者形象。

斯图尔特·霍尔指出媒体中使“他者”种族化, 典型做法是使“差异”自然化。“自然化”的表征策略就是用来固定“差异”。正是通过这种模式, 种族特征被定型化, 即“简化为少数要点, 用几个简明的特征本质地加以确定”。(斯图尔特·霍尔, 2003: 251)霍尔的分析勾勒出“他者”话语的建构模式。正是这种他者话语的建构归约了弱势族群的形象在文学影视作品中的流通及接受。由于《蝴蝶夫人》等剧作推波助澜, 先入为主的东方女子形象占据西方人的想象空间, 制约其想象的模式。东方的一切便在西方人的自我观照中幻化为阴柔屈服之美, 正如赛义德所言, 东方主义并不是原本就存在的现实, 而是人们创造出来的现实。(爱德华·赛义德, 1999

85)在历经失败苦痛之后, 软弱的加利马尔改变策略, 将自身的关照对象转向东方。因而在东方他者缺失的语境里, 西方个体自恋地建构他者形象, 也将自身的身份突显出来。

加利马尔来华以前, 就已经把自己深深地嵌置在东方主义观念之中, 而他的中国之行刚好为他提供了一次验证的机会。所以, 当他欣赏中国戏子表演的《蝴蝶夫人》片段之时, 与其他观者相较之下, 他更为投入, 倍感兴奋, 深深痴迷。因为他一直期待的画面终于如期展现在他的眼前, 现实完美匹配自我的预设。顿时, 他也再次遁入自我的虚幻世界, 为自己而暗喜喝彩。在戏子身上, 他看到自己期待已久的东方(女性)形象。在与中国戏子的交往中, 加利马尔玩弄伎俩, 使用权力制衡, 实施策略让对方屈服让步, 实现自己的东方梦想。一连几个星期回避不见, 不写信也不打电话。因为他确定对方在等待他的莅临。他感到“人生的第一次权力的涌动, 男人的绝对权力”(David, 1989: 32)。收到戏子的信件, 他倍感幸福, 也为自己的策略成功而得意。往日的阴晦一扫而光, 在东方的土地上他拾回自信, 可以施展个人风采, 树立权威的男性形象。宋丽玲的不断来信让他庆幸; 信中屈服的遣词也让他满意自己的策略。心中早已构建的蝴蝶夫人的雏形开始呈现, 西方男子的自尊也逐渐表露。在与托伦的对话中, 托伦认可了加利马尔的才能, 说到“一年前, 你不会是后备人选, 但是近几个月,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已经变得这么外向而自信”(David, 1989: 37-8)。这一切都表明, 加利马尔参照他者形象, 自身的男性权威得到确立和认可。

总之, 《蝴蝶君》中加利马尔自作聪明地玩弄了他者的游戏。通过对中国戏子的他者身份的建构, 他拾回自信和尊严。《蝴蝶君》里并不是法国外交官向中国旦角演员献祭, 而是向内在于自我的幻想或信念献祭, 是一个人, 一个民族, 一个世界向他自己心像的膜拜, 这恰如在水边痴迷于自己美丽影像的纳

西西斯,是自恋性的拥抱自我。(宋伟杰, 2003: 139)所以,加利马尔所看到的他自恋型的影像投射,是他建构的理想模型的视觉效应。通过他的视角,西方男性视域下的中国男性他者形象展露无遗。加利马尔从未细究戏子的真实身份。对于他而言,戏子的真实性别已经不再重要。他所关注的是自我精神世界内的他者形象,一个由他来赋予意义的幻象。最后当戏子裸身相对,加利马尔坦言“你展示给我你真实的自我。而我所爱的一切只是一个谎言。”(David 1989: 89)可见,即便面对事实真相,加利马尔也不愿舍弃自己的幻象。

3 华人男性身份的自我表述

美国华裔写作与主流文化归约下的没有英雄、没有正面人物、没有真实性可言的“华人形象”之间存在着无法回避的关联性,任何有意义的华裔写作都不得不在表述华人这个“话语场”中面对主流话语进行自我表述。(卫景宜, 2002: 17)面对主流文化的干预,美国华裔的创作面临种种瓶颈限制,而不同的作家选择的道路有所不同。在《蝴蝶君》中剧作家选择戏子的男性主体,借用戏子的身份化解主流文化对华人男性的归约,实现华人男性身份的自我表达。由于文化习俗的关系,男性出演戏剧女性角色并不出奇。但是,这种文化实践使得华人男性的性别权威遭受质疑,也符合西方强势文化对东方文化的东方主义预期。西方宰制文化势力把种族特权渗入到性别层面,对东方/华人男性进行了象征性的阉割,将其族群属性定义为“女人气”,以确立自己的男子气概与统治和理性。(葛亮, 2006: 109)对于这样的处理,单德兴认为,“如果说这出戏颠覆了有关屈从的亚洲人的刻板形象,它另一面反而加强了狡猾的东方人的刻板形象。更糟糕的是,它也肯定了亚洲男人是女性化的这个刻板形象——亚洲男人竟然女性化到了可以被当成女人的程度。(单德兴, 1994: 183)这种忧虑不无根据,但是

也折射出主流文化强势话语干预之下,华裔写作面临的困境。但是不可否认,戏子宋丽玲巧妙的化被动为主动,利用加利马尔的东方主义他者形象的预期,主动地模拟预期的他者形象,最终冲破了他者身份规约的牢笼,实现身份的自我表述。

戏子宋丽玲在表演西方戏剧《蝴蝶夫人》之时,他也深入了解西方人的东方观,尤其他们对于东方女性的约定俗成。表演完《蝴蝶夫人》歌剧片段之后,他和加利马尔的对话就直奔主题,毫不避忌。宋丽玲能看破西方男子对东方女性形象自我构建,让加利马尔顿时失语。他的这一表现,让来自西方世界的加利马尔对自己构建的形象发生了质疑,同时也对东方更加充满猎奇心理。加利马尔沉入自我探求的世界,真正的投入到寻求完美他者的游戏。如果说加利马尔得意地展开他者的游戏,那么宋丽玲也将计就计,主动地参与他者游戏,实现自身的突围。宋丽玲对自身的生存状态颇为得意。“为什么京剧里要有男性扮演女性?”他给出的答案便是:“因为只有男人才知晓女人该如何去表演”。(David 1989: 63)就自己的成功表现与估算,他更加钦佩自身的模糊生存状态。面对审判,他也最终道出了东西方冲突以及“西方对于东方有一种国际掠夺的思维”,所以由“当西方人来到东方,他思想已经混沌。”(David 1989: 82)这样简洁的语言,宋丽玲道出了西方想象模式中对东方的他者化规约,斥责他们咎由自取。审判之后,他向加利马尔展示自己的真实性别,击碎外交官二十多年的梦幻,并且宣称“我不‘仅仅是个男人’”。(David 1989: 88)透过宋丽玲的呐喊,可见他对个体真实身份的渴求,不希望自己的身份掩盖在任何宏大的字眼之下。对此,陆薇评价为“第一次让观众听到了亚洲蝴蝶自己发出的声音,其意义无疑是积极的,极具开创性的。”(2007: 203)

宋丽玲性别模糊的生存状态带给他的,既有和西方男子交往的顺畅,也有来自国内

的责难。他没有得到东方群体的认可,沦为变异的混合体,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虽然骗过了西方男子的眼睛,他却躲避不了本土群体的视线。在那场他者的游戏当中,宋丽玲也沦为牺牲品,将自身放逐到一个与本土群体不同的他者的地位。因而,宋丽玲的暧昧身份并不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形象,也得不到自己族群的认可。在这场荒唐的爱情下他只是个替代品,装扮西方人期待的东方人的形象,完成使命。他的生存模式是个特例,不足以代表东方的整体男性。如果,仅仅从宋丽玲的装扮就得出他的角色颠覆传统男性形象,是否应该考虑他的形象又再次陷入傅满洲的恶魔化身的套式,加重了西方人对东方男性的仇恨。针对《蝴蝶君》中的华人男性形象,宋伟杰评论到,“《蝴蝶君》在批判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在东西方关系中的误识、偏见以及性别隐喻中的扩张心态时,进行的是有限度的颠倒,而不是全盘换位。”(宋伟杰, 2003: 139)当西方社会对东方人形象设置了极端的模式样板之后,想要做出颠覆改变,困难重重。如果说《蝴蝶夫人》帮助西方编织了对于东方的定型化偏见,《蝴蝶君》无疑试图拆解这一罗网,实现逃逸或突围。然而这是“逃脱中的落网”,黄哲伦的戏剧无形中又强化了亚洲人的狡黠善变,难以捉摸、亚洲男人缺乏丈夫气等刻板形象。(宋伟杰, 2003: 140)由此我们也能看出,在美国主流文化的强势干预之下,华裔男子身份的自我表述道路艰难。然而戏子这种部分重复、部分颠覆的混杂策略,使得华人男子得以发声,其意义不可忽视。

4 从操控他者到对话他者

《蝴蝶君》中东西方势力再次相遇。不同于《蝴蝶夫人》的凄惨爱情故事,《蝴蝶君》夹杂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让东西方政治在一场虚饰的爱情下交锋。利益驱动外交局势剑拔弩张,两位男主人公都成了政治利益的工具。基于对东方他者的预期,加利马尔信

心十足地展开工作,搜集情报。加利马尔来华后自信心和男性权威的恢复,也反映出西方男子在身份确立中对东方他者的依赖。在对东方戏子他者化的过程中,加利马尔实现了自我认同。然而,戏子宋丽玲巧合地明晰西方人的东方主义视角,并利用了这一知识挫败加利马尔的计划。当加利马尔在法国接纳了宋丽玲,这也表明加利马尔的东方主义预期仍未泯灭。宋丽玲模拟东方他者身份,帮助加利马尔拾回信心,确立身份。但是当宋丽玲脱去伪装,直面加利马尔时,法国外交官的身份与信心再次陷入危机,不再稳定可靠。所以,当他了解事实真相,只好一厢情愿的采取鸵鸟政策,自我装扮,构筑期待的镜像。(宋伟杰, 2003: 139)

《蝴蝶君》揭示操控他者可能会带来一时的成功与喜悦。但是加利马尔的悲剧让我们看到了这一思维定式的毒害。剧本没有采用正面的对抗手段,而是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戏拟了殖民话语,在其内部引起了含混与杂糅,从而有力地消解了殖民话语的权威。(陆薇, 2007: 204)我们也可以看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权力操控不是单向的。操控他者也会转变为一场危险游戏和权力博弈,并且被殖民者的抵抗也可以不是武力的反抗。作家在剧作《蝴蝶君》中应用的策略类似于霍米·巴巴在理论层面的实践。王宁认为,巴巴的后殖民话语是一种介于游戏性和模拟性之间的独特方式,用来削弱西方文化的霸权。(王宁, 2002: 54)《蝴蝶君》的创作策略也正是以一场“他者的游戏”消解了西方的强权地位。臆断他者的依附性,忽视他者自身主动的模拟性,将他者静止化、本质化,带来的将会是接踵而来的加利马尔式悲剧。因此,有必要超越殖民定式思维,从操控他者的游戏转向对话他者的协商。

黄哲伦本人坦言,在该剧中并不是要宣扬东风压倒西风的政治观点,而是希望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今天,东西双方都能反省自我,丰富自我,彼此坦诚相待,“切穿”层层

文化和性别的错误感受。(David 1989 100)所以,从剧作家的一番诉求来看,他渴望的是文化交流间的平等,而不是挪用他者身份的尔虞我诈。正如卢俊所言,“抛弃旧有的刻板形象,由对立对抗转为对话和交流,这就是黄哲伦在《蝴蝶君》一剧中所要表达的观点。”(卢俊,2003 234)那么究竟是否存在沟通的可能性?对于这一点,学者陆薇乐观地回应:“东方与西方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模拟者与被模拟者之间的关系”存在“沟通的希望”。(2007: 197)当东西方超越思维定式,走向协商,对话与沟通才会成为可能。

5 结语

《蝴蝶君》以一场“他者的游戏”警示操控他者的危险性,为观众展示了他者的潜能。在欧洲文化的强势之下,东方形象以他者身份被表征呈现,加利马尔眼中的华人戏子就是一个例证。虽然西方强势文化可以凭借主观臆想,建构刻板的他者形象,然而,他者是否能够彻底被操控?《蝴蝶君》就以一场“他者的游戏”戏弄了西方男子的自恋和权威。霍米·巴巴收录在专著《文化的定位》中的《狡猾的驯服》(Homi Bhabha 1994 93-101)一文也做出了回应。对于强势的殖民文化,他者不是单纯地接受或抵制,而是采取了接受与反抗并存的杂糅与颠覆策略。因此,操控他者的幻想注定破灭,无法施行。这也就决定了,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对话他者势在必行。

注释:

(上接第 71)

但是如果国家所追求的其实是 soft power 则我们的真正目标应该是一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式的吸引力。根据奈的定义,可以认定这种吸引力主要应通过构建起外人主动学习效仿的文化,建立并且践行一个独特而又富有全球感召力的价值体系,制定、推行广获国际社会尊重(或敬畏)的内、外政策,产生和扩展这

①本文系广东工业大学校青年基金(编号 072064)资助项目阶段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David Henry Hwang M. Butterfly [M]. New York PLUME, 1989.
- [2]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3] 爱德华·赛义德. 爱德华·赛义德自选集 [M]. 谢少波, 韩刚(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4] 葛亮. 安能辨我是雄雌——由《魔旦》与《蝴蝶君》的比较分析看华人(男性)的文学再现策略 [J]. 国外文学, 2006(3): 109.
- [5] 卢俊. 解构蝴蝶夫人: 论黄哲伦的文化策略 [A]. 程爱民(编). 美国华裔文学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6] 陆薇. 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7] 斯图尔特·霍尔(编). 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C]. 徐亮, 陆兴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8] 单德兴. 张敬珏访谈录. 单德兴, 何文敬(编). 文化属性与华裔美国文学 [C]. 台北: 欧美研究所, 1994.
- [9] 宋伟杰. 文化臣属·华埠牛仔·殖民谎言——论华裔美国作家刘裔昌、赵健秀、黄哲伦 [A]. 程爱民(编). 美国华裔文学研究 [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10]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 [M]. 陶铁柱(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 [11] 王宁. 叙述、文化定位和身份认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 [J]. 外国文学, 2002(6): 54.
- [12] 卫景宜. 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 [M].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2.

收稿日期: 2009-11-23

作者简介: 李道全 (1982-), 男, 安徽东至人, 讲师, 清华大学外语系博士生,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

种吸引力。例如, 在国际舞台上敢于见不平则鸣, 勇于大声疾呼以伸张正义, 恐怕要比砸下多少笔巨资搞“国际公关”和“形象再塑造”, 对于增强我们的“软”国力要管用得多。

话语无小事, 翻译关大局。如果掌握话语权(包括关键译名审定权)的人士不屑理会这一点, 则纵有识者, 恐怕也只能徒呼“奈”何了。